

非洲研究丛书

CHINA IN AFRICA

DISCOURSES AND REALITY

中国在非洲 话语与现实

严海蓉 沙伯力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非洲研究丛书

中国在非洲

话语与现实



严海蓉 沙伯力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 / 严海蓉，沙伯力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

(非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9978 - 9

I. ①中… II. ①严… ②沙… III. ①中外关系 - 研
究 - 非洲 IV. ①D82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2205 号

· 非洲研究丛书 ·

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

著 者 / 严海蓉 沙伯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张礼恒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5 字 数：407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978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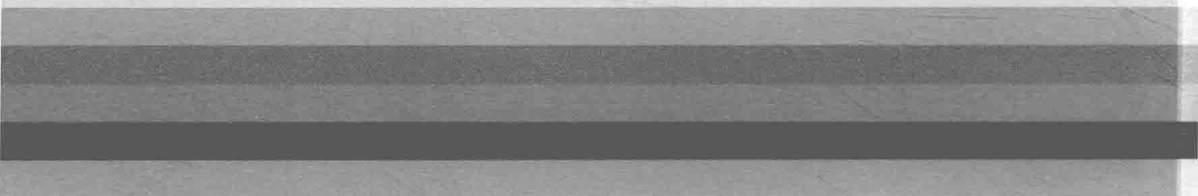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HINA IN AFRICA

DISCOURSES AND REALITY

Three horizontal bars of increasing darkness, from light gray to black, spanning the width of the page.

目 录

导言 “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	1
------------------------	---

第一部分

中国、非洲、西方及殖民主义	25
友谊与利益：中非关系的特色	104
“中国在非洲”：全球体系的困境	117
中非关系的非洲视角	146

第二部分

关于中国的隐喻?：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囚劳的谣言分析	189
殴打“中国人”：赞比亚科蓝煤矿枪击事件的前因后果	217
农业资本主义，抑或新殖民主义?	
——中国对赞比亚的农业投资	246
中国人性侵案：在非洲“民主典范”国家	
——赞比亚的种族化视角	274
“全球帝国的开端?”	
——关于“中国在赞比亚铜矿采掘”的论述与争论	362

导言 “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

一 引言

中国人“走出去”、走进非洲有不同的前世今生。17 世纪后半叶，荷兰人开始把印尼人、印度人、马达加斯加人当作奴隶运往非洲的开普敦，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把一些华人从印尼带去其在开普的殖民地，这些华人有些是犯人（往往因欠债入狱），有些是公司的奴隶。在荷兰人的开普殖民地（1658~1795 年），这些华人与来自南亚、印尼的人们一起被视为“黑人”。^[1]19 世纪后半叶开始，约有两百万中国人陆续到达南非，其中一些是契约苦力，他们在新开发的金矿劳作。19 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和消亡，大量的中国人漂洋过海，去往东南亚的种植园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开发的金矿做苦力，或参与修建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way）、加拿大太平洋铁路（The Canadian Pacific）、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和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

1902 年和 1904 年，南非分别推出限制和禁止华人移民的法案。这也并非独特，而是顺应了当时欧洲关于东北亚的“黄祸”话语，跟随了当时新兴移民国家的排华潮流。19 世纪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发明了“黄祸”一词，19 世纪后期 20 世纪前期，不少西方的作家以“黄祸入侵”作为小说的题材。^[2]如 1912 年英国作家萨克斯·洛莫尔（Sax Rohmer）创作了虚构的超级恶人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系列，他在 1913 年描绘了这位潜伏在大英帝国心脏伦敦、运行一个庞大的地下集团、时刻计划着颠覆大英帝国的清朝王族后裔形象：



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瘦高，耸肩，像猫一样地不声不响，行踪诡秘，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撒旦的面孔，秃脑壳，细长眼，闪着绿光。他集所有东方人的阴谋诡计于一身，并且将它们运用发挥得炉火纯青。他可以调动一个富有的政府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想象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你的头脑里就会出现傅满洲博士的形象，他就是“黄祸”的化身。^[3]

“黄祸”是西方的想象，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指出东方主义是西方的话语建构。中国作家老舍在20世纪20年代于伦敦居住了五年，这五年期间，他观察到了中国人被建构的过程：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們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劳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4]

“黄祸论”的建构事出有因。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了或在西方内部发生“种族”暴动，^[5]或有外部力量对西方进行“种族”入侵^[6]的文学政治主题。“黄祸论”即属于这类话语的一部分。这类主题的小说、电影描绘了黑人和亚裔或从内部攻陷，或从外部占领“白人文明”的主要国家。很多这类主题的故事采取了一种回顾往事的形式，故事由未来21世纪或22世纪的某个人回忆19世纪或者20世纪的失败。

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全球既有的种族等级遭到“他者”的颠覆。所以，“黄祸论”是西方的故事，在欧洲表达的是欧洲列强的统治精英对殖民体制及伴随殖民体制的种族等级制可能被颠覆的恐惧。

在当时新兴的移民国家，“黄祸”作为话语手段功能有些不同，主要用来在多族群移民的过程中维护白人优越的地位。以南非为例，20世纪初，南非白人商铺业主为了维护他们的垄断，压制华人商铺的竞争，向政府控诉华人，说华人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和严重的威胁”，代表了一种“恶在发展壮大”。当时，南非印度人办的报纸发表了一个评论，嘲讽这一控诉，“如果允许华人商铺向华人出售日常必需品，这对欧裔的商人来说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是高度的不公正。这也等于欧裔的商人们承认他们完全无法跟华人竞争”。据猜测，这篇评论可能就是甘地本人写的。^[7]新兴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则一方面需要中国劳工，另一方面则先后出台了排华法案：美国的排华法案开始于1882年，加拿大的排华法案开始于1943年，澳大利亚的“白色澳大利亚政策”开始于1901年（针对华人和其他人群）。

1907年南非的殖民政府要求“亚洲人”用指纹印和其他个人信息进行特别登记，并要求他们携带通行证。为了抵制这一对“亚洲人”的歧视政策，不少中国人和印度人冒着被逮捕、监禁和遣返的危险，参与了消极抵抗运动（passive resistance）。领导这场运动的有后来闻名于世的甘地，也有华人领袖梁佐钧（Leung Quinn）。它是甘地后来著名的消极抵抗运动的起源。南非殖民政府对包括华人在内的非白人进行了种种苛刻的歧视和限制，包括限制华人经商、禁止华人开矿。到了50年代，在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华人和其他亚裔作为“有色人种”也遭到隔离。然而，为了引进日本投资，种族隔离政府把日本人视为“荣誉白人”，日本人享有白人的特权。自80年代起，同样的“荣誉”被给予来自台湾的投资者。有些当地华人为了逃避种族隔离对他们无时无刻的限制，有时候也冒充台湾人，以图获得某些片刻的便利。

1994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垮台，南非进入了民主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政权上的“民主化”和黑人的投票权并没有打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遗留下来的经济结构，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经济上两极分化的阶级隔离更加严重。^[8]21世纪，南非政府推出了安抚种族隔离受



害群体的《黑人经济赋权法案》。不过，作为种族隔离受害群体之一的华人社群却不在法案覆盖的范围内。如果说在种族隔离时期，华人被排除在“白人”之外，现在华人发现他们又被排除在“黑人”之外。经过多次内部的讨论、辩论，华人社群终于在2007年起诉政府，为他们的再一次被歧视鸣不平。2008年高等法院终于裁决1994年已经定居南非的华人属于法案规定的“黑人”类别，享有《黑人经济赋权法案》的覆盖。^[9]

华人在南非的“色变”让人唏嘘，从早期被打入另册为“黑人”，到“有色人”兼偶尔冒充“荣誉白人”，到21世纪里争取成为“黑人”，所变的当然不是肤色，而是粘贴在肤色这个道具上的社会政治关系和其意义，即种族化的内涵。南非华人的“色变”既见证了从殖民时代到后殖民时代的某种进步，同时又说明“种族”绝不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而是近代走向全球化的欧洲资本所主导的政治经济权力发明的一个范畴。随着资本在世界体系里积累的条件和方式发生转变以及国家权力的更迭，这一范畴发生着流变，但并未消失，更没有被否定。下面我们要说到，21世纪西方主流话语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论述也建构了一个“种族化”的框架，这一种族化的框架延伸和翻用了19世纪的“黄祸论”。

2004年我们开始踏足南非，把南非当作我们认识华人进入非洲的近代起点。此后我们多多少少在十来个非洲国家进行过调研，从2007年开始，赞比亚成为我们的主要调研点。选择赞比亚有三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与赞比亚的渊源：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援建了坦赞铁路。赞比亚于1964年独立，到60年代末，国家开始把英美公司掌控的当地铜矿收归国有。在70年代，卡翁达领导的赞比亚一边倡导社会主义，一边支持周边地区反白人殖民政权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为流亡人士提供避难所，因此也面临了当时周边白人政权——南罗德尼西亚（今津巴布韦）和南非的敌意。这条铁路的建设使得位于内陆的赞比亚能够突破当时南非和南罗德尼西亚的封锁，让其盛产的铜矿从新独立的也在推动社会主义的坦桑尼亚出海。因此，这一铁路的修建支持了赞比亚的独立自主，也是第三世界团结和泛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见证，被称为“自由铁路”（Great Uhuru Railway，在斯瓦希里语里“uhuru”是自由的意思）。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起步较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因此赞比亚是最早受到中国资本“走出去”影响的国家之一。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是赞比亚成为西方报道“中国在非洲”的典型。迫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赞比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把国有的铜矿私有化，肢解成七大块分别招商引资，几家外资公司（来自加拿大、南非、印度/英国、瑞士、中国）因此成为赞比亚铜矿界的业主，这就是世界银行给赞比亚所谓“结构调整”的关键内容。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此时购买了赞比亚当时废弃多年的一个铜矿。结构调整对赞比亚最大的产业工人——矿工的就业条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工人们失去了原来国有时代的铁饭碗，社会弥漫着不安全感 and 不满。在2006年大选前10个月，当时的反对党“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领袖迈克·萨塔开始对印度、黎巴嫩及中国籍商人发出警告：如果他当权，则会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稍后，萨塔在竞选策略上开始集中打“中国牌”，把人们的不满引向在赞比亚的中国人。尽管来赞比亚的中国人在逐渐增多——在反对党竞选动员的高峰期2011年，赞比亚有1万~2万中国人，但是中国人的人数和他们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被反对党信口开河地渲染夸大。这样的政治动员曾经引发过针对华人的小规模骚乱。通过电台、报纸和街头活动，反对党的这一话语营造和政治动员有六年之久，直至爱国阵线于2012年上台执政。2006~2012年间，赞比亚的反对党和西方媒体彼此呼应，把赞比亚变成了“中国在非洲”的典型。2012年后，虽然执政的爱国阵线领导人放弃了反华宣传，但是其中一些官员仍然时不时地弹唱种族化的曲调。种族化的话语经过政治动员渗透到社会是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如果没有新的政治来促进社会利益和社会结构的进步，种族化的话语在现有的政治空气下仍然处于可发酵的状态。

二 “中国在非洲”：错误的定性

在赞比亚，不少经历过卡翁达时代（赞比亚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统，任期为1964~1991年）的人对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有感情和记忆。他们当中一位早年在英国留学的、老练的政治家跟我们说，他们对欧美的制度很熟悉，很清楚，但他们跟中国打交道好像有云里雾里的感觉（cloud effect）。中国今天是什么呢？最近不幸因车祸去世的津巴布韦经济学家、非洲农业研究院（AIAS）创始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理事会（CODESRIA）前



主席萨姆·莫约也曾尖锐地发问：今天所谓的新兴市场，本质上是顺从帝国主义的区域稳定力量（subservient regional stabilizer），还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

这个问题因为西方媒体关于“中国在非洲”的大量报道而变得越发不明朗。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非洲48个国家的领导和高层官员出席了这次峰会。西方主流媒体——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惊诧之后，显著地增加了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报道，西方的精英也开始不断地评论“中国在非洲”，其中有大量并非无辜的误解。

西方的误解可以分为量性和质性两个方面。在质性方面，在非洲的中国公司有各种形态和规模，中国的公司、小商贩、工人各有自身的利益和追求。^[10]举例来说，在赞比亚的中资企业就是“由私有、半私有以及公有企业组成的混合体，其中涵盖了不同的企业规模和贸易领域”。^[11]在非洲的“中国商贸公司、个体企业家以及工人往往有自己私人规划，其盘算可能与（中国）国家和地区利益不同……”^[12]但是西方主流话语建构的“中国在非洲”往往把中国政府、中国投资者、中国工人、中国商贩等视为属于一个经过某种统筹的、有整体性的、由国家意旨主导的“中国（集团）”（China Inc.）。这种铁板一块的想象无视中国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之间合谋和矛盾的同时共存，无视中国资本间的竞争，无视投资者和工人之间的差异，无视普通海外中国公民与国家（大使馆）的疏离。

在西方主流建构的这个话语世界里，“中国”是一个异类，碰到这个黑洞般异类，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一般概念和逻辑仿佛不能正常发挥，都失去了解释的功能。以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常常提及的一个话题为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访问非洲时重复了这个说法，就是中国建筑企业在非洲不雇用当地劳工，不给当地提供就业机会，而喜欢大量雇用中国人。^[13]实际的情况当然不是如此，中国企业当然也追求利润，中国雇员的海外就业成本高于本地雇员，因此中国建筑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当然会雇用当地员工。至于中国公司使用多少比例的中国员工，中国员工的数量和比例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变化，这是调研需要探究和解释的问题，也是本书的部分工作。结合当地社会的脉络，其实中国公司海外雇工的状况符合主流的市场经济逻辑和目的论，并不神秘。但是在“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笼罩下，中国公司不用当地劳工的说法一遍遍地被西方主流精英们臆想和重

复。法国哲学家福柯曾富有洞见地指出权力生产了知识。此处我们可以加一句，权力也生产了臆想。

当一般的社会逻辑和经济逻辑关闭了解释功能，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解释“中国”的时候依靠的是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而在想象的意识流里，19世纪的“黄祸论”沉渣泛起。剑桥大学学者艾玛·莫斯利对英国六家主要报纸2000~2007年间关于中国与非洲关系的报道进行了文本收集和研究，发现媒体话语系统性地建构三种形象：非洲的羸弱、中国人的无情残忍以及西方的托管人责任感。^[14]实际上，这三者的形象建构不限于英国媒体，而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共识。我们认为这样种族化的建构绝非偶然，也不仅仅是19世纪的消极残留，而是在21世纪的战略竞争中，西方主流精英对19世纪“黄祸论”话语的调动和翻用。在21世纪“中国在非洲”的话语里，傅满洲的鬼影又出现了。^[15]

西方主流或明或暗地把中国定性为“非洲的新殖民者”。这就是说，一向看好资本“全球化”的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这时却不承认中国资本和中国人员“走出去”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他们把“中国在非洲”排除在“全球化”之外，打入另册，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对其进行隔离处理。对于西方主流中的自由派来说，即便中国不是新殖民主义者，它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破坏规范的异类，给西方在非洲的努力带来障碍和麻烦。在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的话语里，全球化没有被问题化，资本没有被问题化，被问题化的是“中国在非洲”。我们认为，营造一个特殊的、吸引人眼球的“中国在非洲”问题是一个话语手段，由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问题被种族化为中国问题或中国人的问题，从而转移了批判的方向，遮蔽和保护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体系。

通过数据勾勒基本现实

除了定性方面的问题外，西方主流关于“中国在非洲”也有定量上的误解和夸大。针对这些，书中也有很多的反驳、纠错和分析。因为书中内容和数据是几年前写作发表的，因而我们在此提供数据更新，使得读者可以通过最新的数据掌握基本情况。

中国在非投资，一方面应与中国对全球的跨境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对外跨境直接投资，下文简称OFDI）做比较，另一



方面还应该与全球对非洲的跨境直接投资做比较。从全球来看，全球 OFDI 在发展中国家的存量（存量为累计值）在 2004 ~ 2014 的十年间翻了三倍。^[16]2006 年全球 OFDI 存量已相当于全球 GDP 的四分之一，比 1990 年 10% 的低水平有了显著上升。^[17]从中国来看，即使是在中国经济上行的 2008 年一年里，中国对全球的 OFDI 流量（流量为在某一时间的新增投资量）也仅占中国 GDP 的 0.88%，而同一年里，发展中国家的 OFDI 流量占 GDP 的平均值为 2.03%，发达国家则为 4.71%。^[18]中国 OFDI 存量占其 GDP 的比重也远远低于那些主要的发达国家。2014 年，美国的全球 OFDI 存量相当于其 GDP 的 36%，法国为 45%，英国为 54%，而中国此时仅为 7%。^[19]

到 2014 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是 7300 亿美元。此时，世界所有国家的 OFDI 总和为 260000 亿美元。据此可算，中国占世界 OFDI 总和的比重为 2.8%，美国占比为 24.3%。尽管中国 OFDI 的存量已经相当于印度或马来西亚或南非的全球 OFDI 存量的六倍，中国 OFDI 存量到 2014 年仍不及英国以及德国的一半。^[20]

在中国政府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既提供劳动力就业，也能就近获得“世界工厂”所需要的生产原料，并且实现技术和设备的更大化使用。这是资本、产能和技术劳工的三重输出。^[21]截至 2010 年，13000 家驻外中国企业共拥有 110 万雇员，其中 80 万为非中国籍雇员。^[22]2014 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对 OFDI 行为的限制。^[23]该年内，中国企业把近总计 1030 亿美元的资金注入了 156 个国家的 6128 家企业。^[24]

有人测算，中国对非洲的 OFDI 流量可达到 60 亿美元一年。^[25]不过，即便以 60 亿美元算，中国对非洲的 OFDI 流量仍然只占 2014 年中国对全球 OFDI 流量（1230 亿美元）的 5%。^[26]2014 年，中国占全球对非洲 OFDI 流量的比例仅为 4.4%。^[27]并且，2015 年上半年，中国 OFDI 的流量相比 2014 年上半年下降了 40%。这与商品价格走低以及中国公司投资向非采掘业转移有关。^[28]

就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存量来说，在全球中比例也相对较小，2012 年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存量约为非洲 GDP 的 1.5%。^[29]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中国在 2013 年成为非洲第七大贸易投资者。^[30]2014 年，中国对非洲的 OFDI 流量依旧排在美国、法国甚至希腊之后。^[31]2011 年末，当中国对

非洲的 OFDI 存量升至 160 亿美元时，美国和法国在非洲 OFDI 的存量均达到 580 亿美元，英国也已达到 480 亿美元。此时，中国在非洲的 OFDI 存量超过了印度，后者在非洲的 OFDI 存量为 130 亿美元，相当于该国全球 OFDI 的 11%。但是，中国在非洲的 OFDI 存量仍少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在非洲的 OFDI 存量占该国全球 OFDI 存量的五分之一。从账面上来说，此时的马来西亚因拥有 180 亿美元的 OFDI 而被列为非洲第四大投资方，也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在非洲最大的投资国。但事实上，马来西亚绝大部分的 OFDI 都是面向毛里求斯的。这个小岛国被当作投资的中转站，而这些投资最终可能会流到世界上任何地方。^[32]2013 年，南美对非洲的 OFDI 为 186 亿美元，^[33]南非对非洲其他地区的 OFDI 则为 230 亿美元。^[34]

2014 年底，中国对非洲的 OFDI 存量已增至 320 亿美元，^[35]比 2000 年的 5 亿美元增长了 63 倍。尽管如此，这也仅占该年中国全球 OFDI 存量的 4.4%，占全球在非洲 OFDI 存量 7090 亿美元的 4.5%。^[36]在 2012 年，非洲公司对中国的 OFDI 为 142 亿美元，大于中国对非洲的 OFDI。^[37]

截至 2012 年，已有 2177 家“官方注册”的中国企业在非洲开展了非金融类的投资活动。2013 年，这些企业雇用了近 8 万名当地员工。^[38]大部分的企业都来自中国东部省份，其中包括央企以及其他省市级国有企业共 432 家。^[39]2014 年，中国在非洲的 OFDI 存量中仅有 10% 来自私企，^[40]但“在中国几乎没有纯粹的国企。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控股企业。”^[41]中国在全球的 OFDI 也是如此。2013 年，37% 的中国非金融类 OFDI 来自私有企业，^[42]并且有 53% 的中国在非洲的 OFDI 项目是属于私有的。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主要集中于建筑业（42%）和矿业（22%）。私有投资则集中于制造业（31%）以及贸易和物流管理（24%）。^[43]以赞比亚的情况为例，据估计，20% 的中国投资者为国企，剩下的 80% 为私企。^[44]事实上，或者是由于属地法律限制——如赞比亚的法律就禁止外国国有企业登记注册——或者是为了享有投资优惠条件，许多国有企业将其在海外的运行私有化，包括在非洲。^[45]

2013 年，中国对非洲 OFDI 存量的近 62% 集中于八个国家——南非（44 亿美元）、赞比亚（22 亿美元）、尼日利亚（22 亿美元）、安哥拉（16 亿美元）、苏丹（15 亿美元）、津巴布韦（15 亿美元）以及刚果（金）（11 亿美元）。^[46]总体来说，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区域在扩展：2000 年，中



国对非洲的投资仅在八个国家，但到 2013 年这一数字就达到了 51 个。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中国的投资领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集中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采矿业，发展到 2013 年出现的许多其他种类的投资（比如近期的制造业）。^[47] 中国 OFDI 广泛的地域分布与印度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后者 95% 的 OFDI 存量“都在非洲的毛里求斯”。这意味着其中许多的投资可能最终都流出了非洲。同理，尽管看起来有更多的非洲投资流向印度而非中国——非洲对中国的 OFDI 比对美国 and 英国还要多——绝大多数非洲对印投资都是“来自毛里求斯”。这说明，其中不少的投资很可能只是印度公司通过毛里求斯再回到印度的周转活动罢了。^[48]

中国不断增长的制造业投资有助于舒缓制造业在非洲整体处于萧条的就业状况：2000 年，制造业占非洲就业岗位 8.5%，在 2013 年这一比例仍为 8.4%。^[49] 2001 年中国在非洲新生的制造业企业为 7 家，2013 年中国在非洲新生的制造业企业为 75 家。尽管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制造业项目的平均资本投入最低，并且制造业在非洲的产业结构中比较优势最低，对 156 家中国在非洲的绿地投资（即创建投资）的一项研究显示，2003 ~ 2014 年间新生的 64201 个岗位中，61% 来自制造业。在 2013 年，建筑业、金融业以及制造业占据了该年中国在非洲 OFDI 的 50%，采掘业则占了另外的 30%。^[50] 一名被称为“国家产业政策设计师”埃塞俄比亚政府部长曾说，“我并不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由资源驱动的”。^[51]

在贸易方面，2000 ~ 2014 年间，中非贸易额增长了 21 倍，从 100 亿美元到 2200 亿美元，尽管这一数字在 2015 年因世界商品价格走低、非洲出口价格下降而跌至 1690 亿美元。^[52] 2013 年，中国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贸易总额的 24%，较 1995 年的 2.3% 有明显上升。此外，在 2003 年中国占非洲对外出口总额的 6%，这一数值在 2013 年增长到了 27%，相比而言，欧洲占 23%，美国占 21%，印度占 9%。^[53] 但在 2015 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仍然仅占中国与世界贸易的 4.2%，当年中国与世界的贸易量为 4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占 2.3 万亿美元，进口占 1.7 万亿美元）。^[54]

非洲在 2014 年以前的十年内对中国存在着巨额贸易顺差，2014 年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贸易顺差：出口额 1160 亿美元对进口额 1060 亿美元。但 2015 年出现了贸易逆差：出口额 670 亿美元对进口额 1020 亿美元。^[55] 中国向非洲主要出口加工品，非洲向中国则主要出口初级产品。非洲原油、金

属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占非洲对中国的出口比重在 2013 年约为 59%，这一比重小于这些产品占非洲对世界出口的比重（69%），也小于这些产品占非洲对其他贸易伙伴的比重，如欧洲（77%）、美国（77%）和除中国外的金砖国家（87%）。^[56] 制造品在 2008 ~ 2013 年间仅占非洲对中国出口的 11%，部分由于 2011 年前非洲货币汇率与欧元挂钩，货币增值使得非洲的产品价格相对偏高。相反，“非洲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种类十分多样。其中消费品占据了绝大比重，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鞋类以及电子消费品。此外，如机械设备、商业电子品以及交通运输设施等资本品也在其中占了相当的比重”。中国与非洲产品平均价格差在 2014 年约为 50%。尽管“从中国进口低价产品毫无疑问会使得非洲消费者和依赖进口材料和资本品的生产商收益”，这同样表明部分非洲生产商会觉得相当难以和中国进口产品竞争。^[57]

中非贸易的另一个不平衡表现在以工业品换初级产品，不过这并不是中非贸易所独有的特征。非洲和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乃至非洲和其他领先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都具有同样的不平衡的特征。比如，印度在 2014 年与非洲达到了 750 亿美元的双边贸易总额，成为非洲第四大贸易伙伴，位于中国、欧盟和美国之后。但其贸易主要集中于“几个特定的非洲国家”，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及和坦桑尼亚。^[58] 2014 年内，印度对非洲出口的商品中 98% 是消费品、中间品或资本品；2% 为原材料。而非洲对印度的出口商品中，84% 是原材料。^[59] 与许多贸易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官员承认这一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他们表示中国希望“加强合作”以达到促进非洲工业化进程，特别是以加强制造业发展的方式。^[60] 这一合作将会涉及投资和发展项目的援助。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2012 年，中国对外援助累计 540 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放在了非洲，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并且这一比重还在不断增大。^[61]

本书的面向和结构

西方主流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论述及其问题意识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房间里的大象”，其辐射力和影响力当然不仅是在西方。走进赞比亚的商务酒店，打开电视就能收到美国 CNN 这样的跨国媒体提供的新闻，在赞比亚驾车，打开车里的收音机就能听到英国的 BBC 广播，这样的情况当



然不止是在赞比亚。更不用说很多非洲报纸跟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购买新闻服务了。

如何回应西方主流的论述并阐述我们的调研发现，这便成为我们的主要写作面向。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认为中国媒体关于中国在非洲的报道就没有问题。中国官方媒体对中非关系、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浪漫化的溢美倾向。同时，放弃了批判的武器，官方媒体对西方主流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论述难以给予有力的回应。相比于西方主流媒体，中国媒体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是小巫见大巫。而《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则很少受到西方和国际读者的质疑，还往往被认为很客观。正是由于西方主流媒体和精英的影响力，我们写作的面向因此针对他们的“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建构。

西方主流的“中国在非洲”话语建构并不完全外在于非洲，在非洲也有某种里应外合。随着苏东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20世纪世界革命时代的消退，非洲反殖民的独立解放运动在90年代销声匿迹，20世纪反殖民的产物之一——国家主导发展的模式——在80年代遭遇了广泛的债务危机。踏着非洲债务危机的平台，“华盛顿共识”集团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强势登场。在这一背景下，非洲主流政治也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化。历经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斗争，南非人民在非洲人国大党（ANC）的领导下于1994年推翻了白人种族隔离政权，可是掌握政权的ANC遭遇并加入了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潮流。在赞比亚，工会领袖弗里德里克·齐鲁巴领导的多党民主运动（MMD）结束了第一任总统卡翁达的执政，1991年齐鲁巴成为赞比亚第二任总统，然而这位前工会领导却推动了赞比亚的新自由主义化。在21世纪的头十来年，赞比亚参与政治角逐的三个政党都默认或倡导新自由主义。反对党领袖迈克·萨塔选择以反华为竞选策略，把新自由主义给社会造成的创伤和不安全感归罪于在赞比亚的华人和中资公司。萨塔声称“中国来非洲的目的不是投资，而是侵略……这不仅仅发生在赞比亚，这发生在从开普敦到开罗的所有中国人在的地方”。^[62]当然华人不是唯一遭遇排外的“种族化”的受害者，南非在21世纪的2008年和2015年发生过两次针对移民的暴力骚乱，受害者主要是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黑人移民，并没有涉及华人。作为赞比亚国内政党竞争的策略，萨塔把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种族化为“中国人的问题”，呼应了西方主流“中国在非洲”